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四期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11c)

【回首文革】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	高 奇
【文革一页】	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缪俊胜
【当事者说】	特种兵记忆：惊心动魄的“九一三”凌晨	锐 哥
【读书札记】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丁 东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

• 高 奇 •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总理费尽心血，全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继续抓紧落实干部政策，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是，这项工作受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阻挠和干扰。

当年，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从事这项工作，现就亲身经历作简要回顾。

◇ 中组部成立专门机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干部被正式立案审查，没有全国统计数字，只有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情况。截至1972年8月，党中央直属单位副部长级受审查未解放的有61人；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受审查未解放的有230人。据吉林、河南、甘肃三省汇报，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171742人。干部的职务愈高被立案审查的比重愈大。据湖北、陕西、四川、吉林四省统计，属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共有5557人；陕西、四川、吉林、广西、

内蒙古五省区的地厅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共有1167人。上述情况说明，“文化大革命”后期解放使用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组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19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揭盖子大会”后，组织工作业务即全部停止。1972年10月，康生宣布中央决定，从军队调干部，组成由郭玉峰负责的业务组（实际是军代表）进驻，领导搞“文化大革命”，承办中央交办的任务，不交不办，也不答复下面请示的问题。1975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业务组，成立党的核心组，并任命了部长，组织工作业务开始恢复。

为贯彻执行中央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指示精神，1972年8月，中组部决定成立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亦称审干小组），指定我牵头负责，在部主要负责人具体领导下承办这项任务。小组工作人员由原中组部、中监委选调，开始只有5人，后陆续增加到14人。1975年核心组成立后，将审干小组同办理调查任务的小组合并成立调查组，我作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仍分工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落实干部政策的任务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审核研究各单位上报的中央局书记、省市区一、二把手，中央机关副部长的审查材料和结论，逐一填表或写出专门报告上报中央；二是研究中央批办的专案审查对象的审查材料，向中央写出报告或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三是牵头研究党政军三个系统上报中央的干部审查材料和结论；四是参加释放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工作和进行处理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试点等。这些任务不是一次明确，而是临事决定、陆续确定的，工作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落实干部政策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指示精神，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党和受审查干部高度负责。大部分干部审查材料事实的认定和定性处理，都要同原审查单位反复核对和交换意见，有些则要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查，得出最后结论。

◇ 以毛主席批示和中央指示为工作方针

“文化大革命”后期，解放使用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中央没有发布有关政策规定文件，主要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有关批示和中央的指示精神。1971年10月4日，毛主席在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师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师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他以讲话的方式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他出席了陈毅追悼会，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明确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否定。他对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的不少来信都及时作出批示。他在一同志子女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一中央专案审查对象家属来信上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在北京市委原一负责同志亲属来信上批示：旧北京市委一案无人负责，多年不处理，似欠妥。他针对主张将“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自杀的同志予以党内除名的意见，在信访摘要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党籍）吗？等等。特别是1973年1月他讲的“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三句话，成为解放使用老干部的总的指导思想。

1972年8月，中央指示，（审查干部）要根据毛主席讲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要逼供信，逼供信的要重新审查的精神办理，做到实事求是。后陆续明确：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解放使用老干部按先易后难的精神办理；解放使用老干部按四条原则办，即：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这些批示和指示是陆续下达的，少数有转来的批件，大多是口头传达的。经过认真学习，领会精神，作为解放使用干部、落实干部政策所遵循的方针原则，在工作中贯彻执行。

由于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各级党委，全党缺乏统一认识，执行中常常遇到各种不同意见和阻力，有些人的问题甚至长期同原审查单位达不成共识，工作难度很大。

◇ 党的十大前解放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党的十大之前，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主要完成了四项任务：

一是对各单位按规定范围报到中组部的干部审查报告逐一进行审核研究，对其中缺少本人交代或组织查证材料的、事实没有查清或结论定性不当的，同原审查单位进行沟通协调，要求补充或进行修改，直至准确无误后进行摘要，分批上报中央。对中组部几次上报的名单，周总理都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对有些人的材料进行了修改。到1972年底，共上报了84人。后根据中央指示，又将陈云、李井泉、张闻天、张鼎丞等一些老同志的材料进行摘要，经本人同意后列入了上报名单，总计97人，于1973年3月14日正式付印报给分管此事的中央领导。3月23日、24日，我随郭玉峰到京西宾馆，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作了详细汇报，并按要求代他们四人写了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

二是研究统一上报中央名单的内容。根据中央指示，解放使用干部的工作由党政军三个系统分工进行，除中组部负责党的系统外，国务院系统的由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军队系统的由总政治部负责。三家上报名单的内容、格式都不尽相同。1973年1月末，周总理指示，由中组部牵头研究上报名单的统一内容和格式。为此，2月2日，郭玉峰和总政负责人田维新、国务院业务组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在中南海开会，要我参加，进行了具体研究。议定，要统一政策、统一内容、统一表式。表中要有本人职务、年龄、籍贯、民族、入党和参加革命时间、审查的具体情况和结论意见。并确定一重要原则，即凡定为敌我问题本人不同意的，不得定性上报。责成我设计表格样式，由三家填写上报。7月18日至24日，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连续七天讨论了三家上报的300多人的名单。会后，根据周总理指示，中组部一负责人和我同国务院业务组、总政抽调的几位同志一起，对政治局讨论过的名单又逐一详细研究了一遍。8月2日，党政军三家负责人在中南海开会，听取我们的汇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对有些名单的内容作了修改，而后正式上报中央。

三是办理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其中重要的有：代中央起草恢复邓小平（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摘录九一三后他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作为文件的附件。分析研究中央专案组审查谭震林（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材料，否定了所谓“被捕叛变”、“投降敌人”的问题，向中央写出了报告。分析研究中央专案组和内蒙古审查乌兰夫（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材料，对所谓“投敌叛变当‘国特’、充当苏蒙修特务和分裂祖国”等问题作了否定，向中央写出了报告。调阅审查材料和进行调查，否定了江华（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马日事变”后有被捕嫌疑问题。否定了江渭清（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原第一书记）1935年被俘后存在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组织“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写出向中央的报告，等等。这些同志在党的十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下发后，在全党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打倒的老同志纷纷给中央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要求做出结论、分配工作，许多老同志陆续被解放，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四是审查党的十大代表填的表格和处理反映代表问题的来信。党的十大没有代表资格审查，1973年6月29日，中组部根据中央指示，责成我和另两个组的负责人阅看报来的代表表格，主要审查政治历史问题和路线斗争中的表现，有重大问题的摘要向上反映，请中央决定。

经过几天紧张工作，于7月2日进行了汇总研究，草拟报告列述了表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有一人不宜做代表的意见。7月4日凌晨，郭玉峰找我对报告稿进行了仔细研究修改后付印报送了中央。对反映代表问题的群众来信，属于军队系统的转给总政、国务院系统的转给国务院办公厅处理，属于党中央机关和地方的则直接找有关单位核实来信内容，请他们提出是否影响当代表的意见。先后找了中央统战部和北京、湖南进行核实和听取意见。至7月中旬，向党中央报送了综合情况简报，并附上了反映有问题代表的情况。

◇ 释放和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

释放和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件大事。1975年1月20日传达中央决定，将中专一、三办的案子，由中央政治局同志分管改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四人负责统一起来搞，对案子进行清理，先易后难，分批解决。一是将“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对中专一、三办和中组部、总政、国务院的有关批示集中起来编成册子，进行学习，领会精神，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二是由中专一、三办对案子进行认真研究，定个处理杠杠，先解决一批，除特殊情况外，关押着的先放出来，争取三个月解决问题。中组部责成我负责收集和编印批示。2月3日，郭玉峰和中专一办、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开会，对我收集、编印的批示清样进行了研究，将未列入的几件加以补充后，正式印出20份送给纪登奎。

2月10日，郭玉峰和中专一、三办负责人找河南、陕西两省有关负责人来京，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的指示，明确：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省委研究提出具体安置方案报来经同意后，派人来接，事先由中专一办同本人谈话。这些措施以后都得到落实。

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先放出来的指示精神，各有关方面积极做准备工作。4月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释放人员名单。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中组部和中专一、三办、国务院政工组、总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我和上述单位来的三人作为工作人员。与会的有负责安置审查对象的省、释放人员原单位的负责人。在听取中央领导人讲话后，分组学习此前编印的毛主席的批示；由中专一、三办提出解放人员名单和安置地点，能作结论的释放前作出结论，作不出结论的提出生活待遇意见。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明确在释放专案审查对象时，要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不要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引起震动。会议结束后，我同另三位工作人员连夜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送给纪登奎等几位中央领导。

为具体办理中央专案审查对象的释放安置工作，中组部成立由我牵头的小工作班子，负责同中专一、三办和有安置任务省的联系协调。有关省确定的安置地点，经专案组派人实地考察认可后，由专案组派人护送到安置地点，身体不好的由家属或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除以前已陆续释放的以外，这次集中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属中专一办审查的有69人，中专三办审查的有百余人。如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王从吾安置到湖北孝感，等等。安置到外地的，释放后先在北京的招待所住几天，少数人坐飞机走，多数人坐火车走，直接送至机场或车站。这项工作政治性、保密性极强，要求工作要十分严谨细致。此项工作至7月基本结束，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审查对象被释放出来。

◇ 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试点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

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在中央没有新的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在作定性处理时既怕右又怕“左”，加之派性干扰，大多等待观望，久拖不决，少数作出结论的则多偏“左”、偏严。据湖北、辽宁、陕西、四川、吉林、河南六省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属六省省委立案审查的干部有7721人，至1973年底1974年初未作结论的有2207人，占28.6%，其中大部分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有不少省派人带案例到中组部汇报，但都得不到明确答复，只让省委研究后向中央请示。

由于处理这一问题事关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生命，中央十分慎重。党的十大前，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名单时，让将原报定为“叛徒”的二十几人都拿下来，指示起草一新的政策规定，然后再作研究。以后纪登奎受中央委托，组织中组部及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规定（草稿）》。1975年10月，邓小平针对《规定（草稿）》讲了几点意见：关于群众组织的问题，如老根据地工、青、妇，这样搞如何？前几条杠杠没什么问题，但情节有轻有重，如何解决一下，当中有个缓冲，既要严肃又要具体分析，不搞形而上学；有的定不上叛徒但有错误，定了叛徒的也要给工作、给生活出路。

为严肃慎重，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规定（草稿）》先在中央、国家机关进行试点。试点工作会议于1975年10月下旬召开，各部党的核心组有关成员和专案工作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会议地点在二里沟国务院招待所。试点任务是，学习讨论《规定（草稿）》，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对照研究各部的案例，提出定性处理初步意见。强调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但要严格保密。试点领导小组由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和总政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配十余人，由我牵头，负责联络协调，了解汇总情况，综合研究提出的意见，对《规定（草稿）》进行修改。试点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7天时间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规定（草稿）》，领会精神，联系实际，提出对草稿的修改意见。第二阶段，与会同志回本部向党的核心组传达汇报，根据本部情况，对草稿提出修改意见，成立专门班子，对本部的案子研究提出定性处理意见；同时，由试点办公室根据第一阶段提的意见对《规定（草稿）》作初步修改。第三阶段，参加试点的同志包括有关专案组负责人分成9个小组，对照初步修改的《规定（草稿）》，对本组各部的案例逐一研究讨论，提出初步结论意见，最后由各部党的核心组正式研究确定，按干部管理范围上报。第四阶段，写出试点工作报告，连同最后修改后的《规定（草稿）》及说明，上报中央。

试点工作至12月上旬结束，历时近两个月。当进行到10月底时，内部传达中央要“反翻案风”了，试点中要顶住“翻案风”。讨论中开始批右，研究案例趋向偏严，对草稿提的修改意见趋向偏“左”。这次试点共讨论了39名副部级干部、700多名局处级干部和少数军队干部的案例。试点结束时，办公室抓紧写出工作报告，修改了《规定（草稿）》，经审核后报给纪登奎。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在全党展开，中央对上报的报告未作批复，规定也未下发。对此，纪登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检讨时说：为了处理干部的历史问题，受中央委托，我主持起草了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规定（草稿）》，后来看，这个规定对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搞得偏严偏“左”，虽然没正式下达，但对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起了阻碍作用。

◇ 办理中央交办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具体事项

办理中央交办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具体事项，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紧。据统计，1972年8月至1975年7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批办和临时交办事项共198件（内重件21件）、320人的问题，其中属于审查结论的247人，解除监护放出治病的17人，其他的56人。截至1975年7月，共办完135

件、203人的问题。为办理这些事项，一是调阅审查材料，认真研究后向中央写出报告；二是督促审查单位写出材料，经研究修改形成正式报告报送中央；三是组织力量直接进行调查后写出报告。其中特别重要、机密性强的，部里多指定我亲自动手办理。重要的有：

进行深入调查，否定池必卿是“五一六”黑后台和杀人灭口嫌疑。池必卿原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70年天津市委成立时调天津工作。后华北局军管组向中央写报告，反映池必卿是华北局机关“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有谋杀任某（华北局一中层干部）灭口嫌疑。1971年5月，经中央批准调回原华北局接受审查，查清后报告中央。池必卿一直不服，多次向中央写信申诉。1972年10月，纪登奎指示中组部派人，帮助北京军区党委工作组研究华北局副局长以上干部的审查结论，做到实事求是，特别交代对池必卿的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关键看事实如何。我带组内两位同志住到原华北局机关，对提供的40多人的审查材料逐一分析研究后，同军区工作组交换了意见。为便于查清池必卿的问题，我们到天津华北局干校住了数十日，仔细查阅了所有审查材料和池必卿写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大事记。发现审查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人的揭发交代，说法前后不一，相互矛盾，后又都翻了供，此外无一确凿证据。随后找了7位办案人员、4位军代表、8位办过揭发人学习班的人进行个别谈话，请他们本着实事求是、对党负责的精神，如实介绍审查工作的详细情况，表明对此案的看法。经过深入细致工作，最后判定，所谓池必卿是“五一六”黑后台，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编造出来的；任某是在多次批斗被打的情况下自杀的，与池必卿无关。以上两条均应予否定。

回京后，就此同北京军区工作组、华北局军管组负责人多次交换意见，1973年2月向部里写出了汇报提纲并作了详细汇报。3月，经郭玉峰同意向纪登奎写了正式报告。此后中央分配了池必卿的工作，池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研究写出解放吕正操、胡乔木、黄新廷、王尚荣的报告。他们四人当时均为中央专案审查对象。1974年5月20日，中央指示中组部在一周内为他们写出结论。我在仔细分析研究审查材料后认为：胡乔木在盐城被捕问题应予否定，1935年参加“假党”一事不成立。吕正操1937年接受程潜委任是在为我军改编之前，11月接受改编时向晋察冀边区负责人聂荣臻作过报告，聂荣臻电告了中央；1938年秋鹿钟麟以联络旧部名义进行策反时，被吕正操明确顶了回去；1946年7月和8月，国民党两次策反，并无此事。黄新廷、王尚荣系因与贺龙的关系而受审查，应修改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分配工作。在写出四人审查报告稿和摘录他们写的检讨后，中组部和中专一、三办主要负责人找我进行了几次研究，5月27日送给了纪登奎。

5月29日，纪登奎找中组部等几家单位负责人和我到京西宾馆开会，听取我的汇报并逐人进行了讨论。纪登奎讲：要将吕正操审查情况报告改为查证情况报告，前面写明审查他的要害问题，并说明他曾向毛主席写过“认罪书”，后来翻了，有关犯人的交代也翻了。胡乔木的材料要写好，“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抄他的家，毛主席亲自去他家保的（恰巧胡不在）；他在延安编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供全党学习，立了大功；他的检讨要摘录好。黄新廷历史上没什么问题，让他写个检讨并对林彪事件表个态，然后中央批他的检讨。王尚荣的报告可以了，不必再改。会后我抓紧修改了报告，连同摘录的四人检讨报给了纪登奎。不久，四人获得解放。

研究审查材料。代中央起草为贺龙平反的文件。1974年9月5日，传达中央指示，要抓紧为贺龙恢复名誉，在十天内办好。6日，我在认真研究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材料和写的报告后，认为原报告应予推翻，另代中央草拟文件。我向郭玉峰汇报后连夜写出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等把持，捏造罪名加以陷害，应予平反。所谓“通敌”，是指1933年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到湘西游说贺龙，企图收编，贺龙了解

其企图后，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并发电报告了中央，据此说贺龙“通敌”纯属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经查并无此事；所谓搞“二月兵变”并无任何证据，实系讹传。最后写了一段文字对贺龙一生作了评价。次日，将印出的清样连同有关材料经郭玉峰同意报给了中央有关领导。9月9日晚，纪登奎、华国锋找郭玉峰和我到人民大会堂，我汇报了结论意见和具体依据，认为可以将这个稿子送中央政治局讨论。两天后中央政治局讨论时，纪登奎又让我在原稿上加了一句话。对贺龙一生评价部分，邓小平、周总理作了修改和补充。9月2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 落实干部政策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阻挠

1974年1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右倾回潮”，矛头直接指向前一时期解放使用的老干部。中组部内传达王洪文的谈话：除特殊重要的案件以外，不要报告中央。在此形势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举步维艰，全年只上报了45名副省级以上干部审查情况。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党中央和毛主席督促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7月，邓小平在全国妇联一负责人来信上批示：请中组部亲自过问此事，对一个同志政治生命要热忱关怀，要实事求是，不可马虎了结或拖延了事。中组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督促各地抓紧报送干部审查材料，落实干部政策有了重要进展。但年末即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为叛徒翻案”成为一项重要内容。部里指示，对各地没报来的干部审查情况不要再催，有些问题不好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至1976年5月只上报了49人。我经手的两件事可以具体反映出当时的曲折过程。

（一）坚持定曹荻秋为“叛徒”。为曹平反工作受到百般阻挠和追查。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将其定为“叛徒”。曹荻秋给毛主席写信，详细叙述他1932年被捕情况，表示强烈反对。1975年10月，上海市委派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受审查的原市领导干部的定性处理意见。我根据审查材料指出，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明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曹荻秋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进行复查。事后我对审查曹荻秋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被捕后没承认党员身份和发表反共言论，没供出同志，不应定为“叛徒”，经向部核心组会议详细汇报得到同意后，向中央写了报告，经纪登奎同意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不久，收到张春桥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此事成为一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

1976年3月，曹荻秋病逝，家属要求早日作出结论。4月5日，中组部核心组再次讨论，郭玉峰讲，对曹荻秋案，纪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中央、主席报告。张春桥批，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上海市委则表示，如何定“吃不准”。4月23日夜，郭玉峰给我打电话说，为曹荻秋结论，纪登奎同张春桥谈了，说上海不拿意见中组部不大好办。张春桥说这事难也不难，你要查一下去年组织部的人同上海来人的谈话，查一下就清楚了。在我讲了当时谈话内容后，郭玉峰要找当时的记录看。次日，我用保密电话要王日初将他记录的我的谈话逐字复述并作了记录，送给郭玉峰。报纪登奎看后，让先放一放。这样，对我的追查就拖了下来。6月22日，郭玉峰和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几名负责人谈话，不顾我再次申述，决定按上海1973年定曹荻秋为叛徒的意见上报。报告被纪登奎压下没有批出去，后退了回来。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2月，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次年1月2日在他主持召开的整风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办理此事的过程。胡耀邦听后说：做干部工作不讲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坚持原则，无非是不当官嘛！拿原则做交易是违犯党纪国法。他要我写出事实经过。1978年2月11日，胡耀邦要我一起听取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关于干部问题的汇报。他明确表示，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应当完全平反。不久，曹荻秋得到了彻底平反。

(二)将对宋任穷的平反，上告到中央，被指责“为叛徒翻案”。宋任穷原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受审查。1974年10月，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住中组部招待所，11月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但辽宁一直未将组织关系转来，也未作出审查结论。后几经催促，1975年7月，辽宁省委将结论送宋任穷征求意见。9月派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苍某来京见宋任穷，宋任穷坚持不予接受。苍某到中组部汇报提出，不定“叛变”能否定“变节”，要求我表态。我在听取情况介绍后表示，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况，宋任穷1927年被捕是被释放的，1929年1月部队被打散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回家，参加国民党部队当兵三四月后收罗了一些国民党兵回到了红军。被捕和当国民党兵都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和供出党的组织，没有发表过反对党的言论和文章，不应定“叛变”，也不应定“变节”。苍某听后再表示很受启发，回去后一定认真研究考虑。但此后一直未见到辽宁的结论。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的一天，郭玉峰从中央开会回来急着找我谈话说，辽宁有两次简报报到中央政治局，说中组部为“叛徒”翻案，指的是宋任穷的事情，要我详细汇报去年同辽宁来人谈话的内容，空气相当紧张。“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1月，调查组经反复研究写出关于宋任穷审查情况的报告。经部审核后报送中央。当年10月，宋任穷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78年12月，宋任穷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送胡迎宋的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公开为宋任穷作了平反正名。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把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稳定局势和推动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客观上加强了党内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为终结“文化大革命”，从一个方面准备了条件。但因受到“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阻挠，仍有相当多的干部没有得到解放，冤假错案没有平反，直至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完全彻底解决。

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多数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冒着政治风险，力求实事求是，做了大量艰苦工作，这些应当予以肯定。

□ 原载《百年潮》2011年第8、9期

~~~~~

【文革一页】

我给陈伯达做秘书

• 缪俊胜 •

接到杨德中的电话时，我在北郊木材厂，时为1968年6月。他说派车接我到钓鱼台十五号楼。我到后没几分钟，陈伯达从楼上下来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就让我回去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号楼报到，我就算正式到陈伯达那里工作了。

◇ “夫妻照”和社论的故事

我去那里是在陈伯达原来的秘书王保春调走以后。王离开是因为所谓“傅崇碧冲钓鱼台事件”。傅要到钓鱼台来，联系电话是王接的。傅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王哪有权阻拦呢？进来以后惊动了江青，她火极了：“是陈伯达秘书放进来的，写检查。”王第一次检查没通过。她说：“这样的检查怎么能行？”回来又让陈伯达给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话，这才过关。这还不行，让调出办公室，才又调我来。



陈伯达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跟王文耀搞机要，厨师宋师傅，钓鱼台配的服务员李保平和张素花，还有司机老俞。

在那里的时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那时，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是副组长，可据我观察，江青对陈伯达一点儿也不客气。

有件事让我挺生气。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的厕所没写明男女。会议过程中，陈上厕所，出来碰到江。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看了看门上说：“这没有写女厕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很严肃，当面说陈伯达，旁边还有别人。陈被江训得还不如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陈回去后很生气。我替他打抱不平，说我给主席打电话说说这事。陈说，“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档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后，有一天江青高兴了，让秘书打电话，“叫伯达同志来照个相嘛。”两人并排照了个相，就像咱们说的“夫妻相”。陈当时就没意识到，我却觉得不大对头。大概过了两天，他到毛家湾去（叶群是他老乡，又是他学生，两人谈得来。我觉得，叶的处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让人害怕，叶见人挺亲——假样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说起照相的事。叶说：“你怎么敢跟江青照了个‘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么得了？”说得很严肃。陈一听也很紧张，跟我说，“你是不是到新华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来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车去吧。”我照办了。照片看后没送回去，无影无踪了（肯定是陈伯达烧了）。我只得去跟图片社解释。陈是他们的上级，图片社也不好说什么。第二天，江没取到照片，把图片社的人骂了一顿，说，“我送的东西，你为什么给别人？给谁了？”工作人员说给陈的秘书了。这下可坏了，从那以后，我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陈伯达也用自己的办法对付江青。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有一次中央部级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去参加。姚文元问我：“《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你送去的吧？”我说“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社论题目叫“改造世界观”。那天晚上，为送稿件，陈伯达一连派我跑了八趟，我记得非常清楚。社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起草，陈修改的。陈很重视这个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说：“你这个标题为什么不能放大呢？”放大后还不行，说：“加杠。”就是社论全文加黑框。我说主席批的社论才加杠呢，陈说：“让你加你就加嘛，给他们说加嘛。”加了还不行，说正文排成四号宋，加框，那时四号宋用得很少。最后，他终于说：“好，我睡觉了。”这时都早晨八点钟了。后来，我琢磨，社论的第二自然段是谈样板戏，他要把这一段排到二版去——这才琢磨过来。江青把样板戏看得很重，陈就故意排到第二版来降低影响。

#### ◇ 庐山摔跟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我是惟一跟陈伯达上庐山的工作人员。当时，会议地点保密，陈光说“上山”，“马列著作都给我带上，再带几本毛主席语录”。

会场一般我不去，就在住处值班。不开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看他，比如李雪峰、吴法宪，江青也去过一次。那是华北组“二号简报”出来以前，还互相来往呢。张春桥、姚文元好像没来过。他们来得少一点，开会时都互相见面的。

全会期间，有件和我有关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里，提到“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说：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修补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内容是：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年8月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林彪讲话出来以后，吴法宪他们提出要放林彪讲话录音，放录音后，各个小组讨论，陈在华北组。小组讨论会我去了，待在会议室外面。他的讲话我没怎么听到，但是，汪东兴和陈毅的发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汪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答应！”陈讲话也很激烈，说“我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现在有人反毛主席，谁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简报华北组弄得最快。实事求是讲，到主席发火为止，陈伯达没看到那期简报，也没有修改。这事出来以后，主席就召开常委扩大会，就扩大到各小组组长了，华北组是李雪峰、郑维山（这都是被扩大的），扩大以后就批评他们，批评得很严肃。陈自己写的会议记录上，毛主席说他“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他回来后很不高兴，跟我说“主席批评了我”。我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因为这事就休会了。陈就出去转，照了好多相。后来，会上有人批评他，“大祸临头了还不知道检查自己，还游山玩水？”他受了批评，情绪不好，总理就派了个医生过来照顾他。

这个事出来以后，高碧岑（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来电话说，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该去）。谈了有一个小时。临别，主席还亲自送他到小车边。他回来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他们”，叫我说就是“老四人帮”，就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 ◇ 我对陈伯达要态度

要说他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主席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还给他摔过杯子，他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

再一个特点就是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他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他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气随和，从没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耍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一个中央常委处事怎么这样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儿，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说，但生活中，我感觉他平易近人，比较俭朴。他勇于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总理的，从来都不说对方的不是，都承认是自己的错。

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

（缪俊胜口述 李宇锋整理）

□ 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5期

~~~~~

【当事者说】

特种兵记忆：惊心动魄的“九一三”凌晨

• 锐 哥 •

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45分，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警报！“指挥所一等”！！

脸盆大的电铃就挂在我们作战侦察科宿舍的门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铃声显得特别刺耳，惊心动魄。大家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套上衣服，百米冲刺一样奔向指挥所。

不到一分钟，作战、侦察、雷达、通信等各部门各就各位。值班参谋向师长报告：“接上级命令，各级指挥所立即进入一等战斗准备，我已经向各营发出指挥所一等的命令，向师属目标指示雷达发出进入一等的命令。”

师长命令：“抓紧时间做好战斗准备，远方参谋严密掌握雷达部队空情通报，近方参谋指挥目标指示雷达圆周搜索，发现情况，立即上报。”

各专业指战员继续做着自己的战斗准备。我打开专属于我的指挥桌，戴上耳机，要通通向某营的电话，试好线路，等待配合我的指挥台报务员开通无线电通信。

紧接着指挥所里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远方好！”、“近方好！”、“一号方向好！”、“二号方向好！”、“三号方向好！”、“四号方向好！”、“有线通信好！”、“无线通信好！”、“一号目标指示雷达开机！”……。师长指示：“上报师指挥所一等好！请求上级指示！”

接下来各营指挥所也先后报告指挥所一等准备好。上报参谋按参谋长指示向上级报告：“全师指挥所一等好。时间1分55秒。”

上级指挥所指示：“严密掌握空中情况，发现情况立即上报！”

担负着国家空中安全的导弹部队，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在瞪大眼睛，严密注视着祖国蔚蓝的天空，时刻准备歼灭来犯的敌人。苏联亚洲地区、外蒙古、南朝鲜、日本、台湾，祖国版图四周一圈，经常有敌机活动，有时离边界很近，不得不防，所以指挥所经常要进入一等战备。同时上级为了检查备战情况，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更是家常便饭，每个月都有几次，就像陆军部队打背包紧急集合一样。但这一次指挥所一等，第六感觉与平时总有点不同。

突然，远方标图员报告：“情报！”随即远方参谋报告：“发现目标，大型机一架，时速500，高度3000，敌我不明。”师长、参谋长、作战科长一下子都围到远方标图板前。飞机在中蒙边境我方一侧临远向外飞行，随着航线的延伸，渐渐向北飞出了国境，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空中非常宁静。师、营两级多部844、513、514目标指示雷达织出了一张严密的空中大网，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情况，但一直没有任何收获。上级指挥所也没有恢复平时战备的意思。师首长和参谋人员利用时间分析研究起了敌情。

我坐在3号方向参谋的岗位上，指挥3号指挥台的报务员负责对XX营作战命令、指示、报告的上传下达。我本是作战侦察科的测绘侦察员，工作任务都是部队的战前准备，指挥所一等本来与我没有关系。但由于部队发展快，训练任务重，把我们科一分为二，单独成立了训练科，

科里的人数从原来的18人一下子减少到12人。人减少了，可部队却越来越多了，方向参谋不够用（每个方向参谋负责对一个营）。司令部首长认为我以前当过远方标图员和指挥台报务员，对敌情、指挥程序、通信都比较熟，可以当一个方向参谋用，就决定跑警报时我也参加，作为二号战备班子使用。可实际上一号班的人出差、开会、探亲，总也没有满员的时候，所以我只要在营房里，一直扮演着见习方向参谋的角色。

3时左右，上级指挥所命令：“部队一等！”

营房上空马上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部队一等”要求部队齐装满员，各就各位，导弹制导雷达开机，导弹上架，随时可以发射，对目标进行攻击。

3时30分左右，师、营目标指示雷达先后发现情况：“小型机一架，高度2000米，速度200公里。”根据高度和速度判断，这是一架直升机。

直升机在华北上空，慢慢向北方飞去。上级指挥所命令：航空兵某某师负责拦截该架小型机；导弹某某师严密跟踪，待命发射！

指挥所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不是演习，是真的要打仗了。对付这么一架直升机，动用这么大的兵力，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再说，哪儿来的一架直升机飞到内地来了？大家都感到疑惑。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容不得半点迟疑。

友邻航空兵师的歼击机迎着黎明前的黑暗，喷着火舌，响着巨大的轰鸣声，从头顶飞过，在战区盘旋，拦截直升机促其迫降。

直升机在华北某地上空转了一个180度大弯，又摇摇晃晃向南飞去。从雷达情报看，航线极不稳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有时还悬停一小段时间。后来高度慢慢下降，消失在一片大山背后。

目标指示雷达巨大的天线360度旋转着，睁大眼睛观察着一切可疑情况。时间又过去了好久，可空中再也没有任何情况出现。

部队长时间一等，导弹制导雷达和发射架上的导弹长间接电准备，影响兵器工作的稳定性，缩短使用寿命。下面请示制导雷达和导弹是否解除接电准备？参谋长指示：按战斗操作教令执行。

天亮了。上级命令：部队一等不变，制导雷达关机，导弹解除接电准备，目标指示雷达轮流开机警戒，人员在阵地待命。

部队一等不变，就要求指挥所一等也不变。大家坐在各自的战位上，一言不发。谁也不问，谁也不说，谁也不敢再多想。心头的疑虑挥之不去。

1971年9月13日过去了，部队保持一等战斗准备不变。

几天过去了，部队还是保持一等战斗准备不变。

部队长时间保持一等战斗准备，而国家的宣传上又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使大家心头的疑虑越来越重。想想我入伍三年，除了刚入伍那年的一号命令，其他再也没有部队长时间保持一等战斗准备这种情况。而那一年明摆着是苏联要入侵，但1971年时和苏联的关系，通过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华，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而当时又没有国际国内的其他重大事件发生。

其他部队只知加强战备，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我们通过9月13日凌晨的情况，已感觉到国内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人长着脑袋就会想事，理所当然的就想到了9月13日凌晨的事情。那天的空中情况确实会使一个熟悉国家防空事业和参与当时防空作战的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空中情况通报。空军有一个巨大的空情通报网，由各雷达警戒部队组成，覆盖整个祖国领空。这些警戒雷达一天24小时开机，严密警戒着祖国的领空，就像士兵站岗放哨一样，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就会立即上报。最后由军区空军情报总站分析、判断、汇总，向航空兵、导弹兵、高射炮兵等防空部队用无线电广播出来，简称“空情通报”。空情通报掌握的是很严格的，什么情况要报、什么情况不报都有规定，搞不好会引起国际纷争和国内不安。通常情况下敌机会很连续的播报，友机、我机一般不报，我军训练飞机、民航飞机和专机提前通过指挥所向部队通知。而这一次的通报明显不同。

二是明明是一架大型机，从国内向国外飞行，按说应该是我机。但既不在民航飞机的航线上，事先也没有通报，显然不是民航机或国内专机；再说如果是民航机或国内专机，也用不着空情通报。如果是敌机，那么为什么进来时没有通报，在国内飞行时没有通报，单单快出境时通报，还“身份不明”；身份不明的飞机报出来也没用，谁也不能打；而且防空部队知道时已经临近边境，就是能打也来不及了，追不上了；再从飞机的高度、速度判断，这应该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飞那么低、两国又处在不友好状态，在这个方向上又没有航线，前方又没有民用机场。唯一的可能，就是叛逃飞机。

三是后面的那架直升机，它为什么从北京方向起飞也向北方飞？直升机的航程有限，它要飞向哪里？上级命令航空兵拦截，导弹部队待命发射，说明它肯定是叛逃飞机！既然是叛逃，为什么航线那么不稳定？航空兵的拦截飞机距直升机还很远，它为什么自己掉头又飞回来？可能是有人想叛逃，但机上有斗争，劫持的可能性大。

四是两架飞机是什么关系？如果是一伙的，为什么不一起飞？搞个一前一后，喷气式快在前面，直升机慢在后面，直升机哪能飞得出去？如果不是一伙的，为什么时间关系这么紧密？想来想去的可能是大型机叛逃，落下了没跟上去的人，截一架飞机跟上去再说，反正不走也是死，拼一下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五是如果是叛逃，那会是一帮什么人？飞机起飞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会是一般人，起码也应该是能掌握飞机起降的人，如果是几个一般飞行员，全国全军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至少应该是民航或是空军的头头脑脑吧？

想一想就是那么回事，既感到可能又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在心里默默的构思着可能，也不敢议论，只是自己瞎想吧。但不管怎么想，总觉得好像出大事了。

地空导弹部队进入一等战斗准备已经是第二个星期了。大家都勤奋地工作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导弹部队自组建以来，为了作战需要，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部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代号，包括“中央石油勘探队”之类，穿过不同军种服装和便衣，甚至家信要通过组织审查，一个班各专业兵之间的技术相互保密等。更因为全营“一杆枪”，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使全营战斗失利，因此养成了特别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一丝不苟的保密观念。不该说得绝对不说，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看的绝对不看，成了指战员的铁的纪律。9月1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大家也只是睡不着觉时自己瞎想，可能“出大事了”，并没有任何人议论。

长时间一等战斗准备，部队全部按战时工作安排，战勤班子昼夜不离战位，又没有战事，时间长了容易疲沓。部队有一条管理秘诀：永远不能让下属闲着。所以各级指挥员就想方设法在不影响战备的情况下给大家找事做。正好我们作战侦察科阵地勘察测量组在外跑了几个月，前几天刚返回，一大堆图表、数据要处理，并上报下发或归档，赶上一等战备没来得及。科长就安排大家在指挥所展开了这项工作。

科长给大家分好工，有计算的、有制图的、有汇总的、有写报告的，两三天时间，一份“阵地勘察报告”连同相关图表资料等附件，就全部完成了。

由于大家都在指挥所里，这份文件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道工序都是几个工作人员同时操作，反复计算、反复核对，起草报告时，科长、参谋长也都亲自参与进来，按说不应该有任何差错，也不可能有任何差错。所以文件抄正后，科长、参谋长例行公事签名后，就直接递到101首长手里，等101签发。

101接过文件，在首页上端详了一会，又随便翻了翻后面的附件，说了一句：再讨论修改。

看来101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大家一时不安起来。这次参谋长亲自组织，大家又重新计算、校对、汇总，忙活了一天，还是没发现任何问题。科长寻思是不是有两个涂改过的字，就又安排人工工整整重新抄好后，再次送了上去。

101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轻轻扫了几眼，就不慌不忙的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说了声：通知102接替我值班，有事直接打我办公室保密机。径自走了。

大家开始以为101嫌指挥所人多不安静，回到办公室慢慢看，反正办公室与指挥所几十米之遥，也没太当回事。第二天，科长派Z参谋去取文件。Z参谋回来后报告说，首长说先放在他那里吧。

一句话把大家说的一头雾水！101是一个雷厉风行、处事果断的指挥员，在一等战备这么关键的时期，阵地准备也是一件大事，说不上什么时间部队就会拉出去。可是这两天他的表现和以前比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可不是他的作风！首长怎么改脾气了？难道真的是文件有问题？问题在那儿呢？大家又各自陷入了深思。

若干年后，Z参谋等少数几个人说出了他们当时非常正确地分析判断。遗憾的是，我没寻思出来。你呢？

平时处事果断、雷厉风行的指挥员，为什么在913之后的十几天里，面对一份普通文件反复几次不签发，引起了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的猜测。

如果你在那个时代的机关工作过，那么你应该知道当时的公文格式：除遵循普通公文格式

外，都要在文件首页的开头，先写一段和公文内容相关的“最高指示”，接下来是“林副主席指示”。两段语录大概占首页版面的50%，下半页才是公文的标题和正文。

九一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事件发生后，在党中央“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的方针指导下，在社会上未对此事作任何反应，包括国庆节也没有采取特别行动。

关于九一三事件情况的传达，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要求每一级听传达的人都要绝对保密，没有上级的统一部署，任何人也不能透漏任何消息。

9月14日，周恩来向政治局委员，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分批通报林彪叛逃坠机死于蒙古的消息。9月18日，中共中央以《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57号文件），向全国省、部、军级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通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国叛党，自取灭亡”等情况，101首长那时就知道了林彪已出逃的真相。

10月中旬，中央57号文件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地勤人员传达。我们这时候才准确知道9月13日那架飞机的真实情况。

9月下旬，当我们辛辛苦苦把一份上报的《阵地勘察报告》呈送给101时，当时只有101首长知道913事件的真相，包括参谋长在内的我们都还蒙在鼓里。所以参谋长组织我们起草的文件，还是用的传统格式，开头就是“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这对于已经知道事件真相的101来说，显然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签发吧，在林彪已经叛国的情况下，显然不能再用其语录，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一旦追究下来将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签发吧，又实在没有办法向我们这些下属解释清楚。所以只好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反复修改，尽量拖延时间，实在拖不下去了，干脆锁到自己的文件柜里。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所在。

至于说Z参谋等少数几个人能够看到一点点蛛丝马迹，那就是他们太聪明了。他们根据913那天的空中情况，推测国内出了大事，一定是有人叛逃，而且不是小人物（这点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当时也这样推测）。文件反复几次后，他们根据101的态度，认为工作人员没有问题，文件也没有问题，否则101肯定发脾气，并会指出问题的所在。再通过101看文件的眼神，发现101只是在文件的首页上作文章，在首页上停留好久，后面的一带而过（其实后面的都是数据图表，一下子也看不出问题来），这就说明问题出在首页上。首页上的内容就三项，最上面是毛主席语录，这肯定没有问题；最下面一段是文件标题和几句格式化的文字，平时都是那么写的，《参谋业务手册》上有范文范例，也肯定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中间一段“林副主席语录”上，出事的就应该就是他。

想一想，Z参谋等人是不是很了不起！好像有点福尔摩斯的味道吧？这就是我的战友，太有才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

也许是天意，当然肯定是巧合，我从4月份开始写博并按时间顺序写我的军营生活，到今天2007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整整过去了36年。

36年来，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共中央在事件之后的文件里，对失事原因作了解说。近年来，改革开放带来了言论自由，特别是现今网络评论，关于林

彪座机如何坠毁，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种：导弹击落说、燃油耗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

关于导弹击落说，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我方导弹击落，二是苏方导弹击落。对于有些朋友说是被我方导弹打下来的，我可以以专家的身份负责的说：绝对没有。我是一个上世纪60年代参军的防空导弹兵，林彪座机当时的飞行路线全部在我们防区的空域。从“九一三”凌晨1点55分指挥所一等开始，我在三号作战（方向）参谋的岗位上参与了部队指挥所的战斗指挥，经历了眼看着林彪座机在国境外消失，以及稍后对直升机的跟踪。林彪飞机在我们发射阵地上空经过的时候，没有空情通报，弟兄们睡得香着呐。等指挥所一等后有了空情通报，林彪座机已经到了国境线附近，标图板上只标了十几个点，就在国境外消失了。那时部队还没有一等准备，不说目标已经消失，也不说导弹射程够上够不上，我们的导弹伙计也还在弹库里睡觉呐。

说苏联防空导弹击落也不大可能。对于一架没有任何防备、任何干扰的大型客机来说，当时苏军装备的萨姆2或萨姆3导弹，使用的是末端多普勒雷达制导的近炸引信，每发导弹的战斗部碎片是3600（2型）到3675片（3型），战斗教令要求对每架目标必须发射2至3发，上万片碎片可以把三叉戟在空中打成蜂窝，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一个弹丸把飞机打出一个大洞，最后还任其飞行迫降。到军事博物馆看看被我们打下的美国佬的U-2吧，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样了。

后面的四种说法，咱不是专家，试着评评，不具权威性。

关于燃油耗尽说。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飞机起飞时机上有燃油12.5吨，至迫降时共飞行2小时，耗油10吨，应该还剩2.5吨。继续向前飞到苏联的赤塔或伊尔库茨克是不可能的，那的确燃油不够（博主按：根据舒云最新文章《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关于油料不够说，是基于山海关机场没有加上油而说。实际上山海关机场加上了油，加了4吨半，所以林彪飞机起飞时有油17吨）。但可以在附近找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机场。即使找不到机场必须迫降，也应该把燃油耗尽，不可能带油迫降。三叉戟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几乎可以说100%要起火爆炸，完全是自杀行为。

关于阴谋爆炸说。有人评论是毛、周派人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或遥控炸弹，这也不可能，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在午夜以前甚至有可能在周恩来的干涉下飞回北京，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至于说遥控炸弹更是不可能，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飞机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关于机组搏斗说。根据失事现场分析，所有人员包括机械师都脱下了鞋子，飞机也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襟翼，这应该说做好了迫降的一切准备。据负责处理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完全可以排除机上人员搏斗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关于迷航坠毁说。飞机起飞前准备不充分，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的又是从没飞过的航线，又是夜间飞行，没有地面参照物，迷航有可能。但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就是迷航必须迫降，也应该把燃油耗尽，不可能带油迫降，这是飞行员的最基本的一点常识。

所以，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五种坠机说法，导弹击落说根本没有，我是亲历者，我可以证明。其他四种说法，咱虽不敢肯定，但也说服不了我。

□ 摘自“锐哥的香格里拉”

~~~~~  
【读书札记】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 丁 东 •

时间过得飞快，文革转瞬成为历史。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世的只剩下汪东兴一人，其余都已作古。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显得特别珍贵。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等21人，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四人。到目前为止，只有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汪东兴有成本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在内地出版，李雪峰生前完成了回忆录《文革十年》，只在期刊上选登了两章，其余尚未发表。陈伯达去世以后，儿子陈晓农整理出版了《陈伯达遗稿》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美国女学者维克特出版了《江青同志》，披露了文革中江青和她几次谈话的详细内容，算是一种独特的口述史。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篇幅比较大，都是他们自己晚年精心撰写，不受官方结论束缚，去世后在香港出版，引起史家高度关注。这三部回忆录，就出版时间而论，以《吴法宪回忆录》为最先；就史料价值而论，以《邱会作回忆录》为最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史科学已经进入吴李邱时代。

下面，我仅从三个方面，谈点读《邱会作回忆录》感想。

其一，这部回忆录独家披露了史家从来不曾涉及的若干高层政治决策。

在通常情况下，中共都是预先内部商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名单，才召开党代会。但九大例外。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政治局的候选名单还没有。次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实际上是商议“组阁”。对于政治局候选名单的产生过程，五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但黄永胜当时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详细介绍了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情况，九届一中全会后与邱会作又有私下交谈，所以，《邱会作回忆录》就是有关九届中央政治局“组阁”过程最重要的史料了。

邱会作记述：林、康、周、黄四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首先说了话，他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三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毛主席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五人独裁吧！”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密切关系。”毛主席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25至30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三人小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内，几乎与外界不产生任何联系。周总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准接。

三人小组产生的第一个名单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

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二十三人。关于江青，黄永胜在讨论中表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应讲功劳，但不一定要当选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主席，为了大局。康生一听就火冒三丈。会后总理对他说：“你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也不讲。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毛主席看到了上报名单。主席对上报名单基本满意，只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主席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总理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着头皮留下来。”黄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在新的名单上，毛主席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二十六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在一起工作。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十二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了毛主席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总理等三人接着就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接待了总理等三人之后，自动回避了。周总理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主席住处开会，确定了二十五人的候选名单。毛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毛、林、周、康、黄五人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主席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主席的安排，毛主席最后说：“我也同意。”

纵观以上过程，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十分微妙。有人据此分析毛泽东的本意是既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常委，也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我认为，不赞成江青进常委，应是毛泽东的本意。此前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说，一月十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毛泽东曾经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九大）代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根据毛泽东两次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就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江青进政治局，是有疑问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他不让谁上，谁就不可能上。李讷、毛远新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效禹也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在江青的名字上划叉，加上了叶群，却有深意存焉。无论是资历，还是政治影响力，江青都超过叶群。如果真心拿下江青，就没必要加上叶群。周恩来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所以把江青和叶群一起列入了候选名单。这样，原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温玉成外，全部进入了政治局。这也是对九大以前权力格局的承认和延续。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否定了造反起家的地方领导干部王效禹，却提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纪登奎和能够“一碗水端平”促成大联合的军队干部李德生进政治局，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考虑。

其二，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咽：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

“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

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 原载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1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